大古都条件变化视野下的成都大古都地位认定

何一民,陆雨思
(四川大学 城市研究所,成都 610064)

摘要:大古都作为一种城市品牌,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研究也成为热点。本文在梳理学术界关于大古都认定条件的前提下,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深入考察成都的都城历史,认为成都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其都城历史积年在千年以上。成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重要影响的城市之一,从汉代至唐宋一直居于全国大城市前列,无论是作为都城时期,还是失去都城地位之后,也都是西南地区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虽然成都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过数次毁灭性破坏,却总能劫后再生,先后出现数次发展高潮,其影响力不仅超越四川和西南地区,而且也达到西域、中亚和南亚。综合考察成都的都城历史,成都完全符合大古都的标准,跻登中国十大大古都行列,实至名归。

关键词:中国都城史;古都;大古都认定;成都
中图分类号:K9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2-0155-1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古都研究成为古都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者围绕个别古都可否列为大古都而展开了对大古都条件的系列讨论,由此推动了古都研究的深入开展。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其都城地位未受到相应的重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若干研究者对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不太关注,也不甚了解。本文主要根据目前学术界提出的大古都认定条件,结合最新考古发现的新史料、新研究,对成都的都城历史进行考察,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大古都认定条件的变化与成都大古都问题的缘起

古都是古代城市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古代国家政权所在的城市,又称国都、京师、京都等,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对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影响巨大。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清以前中国疆域内曾兴起过数量甚多的各类政权,有的政权统治时间较长,有的政权存在时间较短,甚至旋起旋灭;有的政权中心在今北方或南方,也有的政权中心在东方或西方;每一个政权建立后,都会以某一个城市为都城,作为立国之本,因而几千年来中国的都城数量甚多。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和统计:中国"内地与周边各地合计,共有古都 215 处,可知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权 277 个"①[1]。尽管这些数量众多的古都有很大的差别,不同的古都在中国历

收稿日期:2016-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一民(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市文广新局智库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史;
陆雨思(1990—),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史。

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关于古都是否有等级差别却无人论及②。此后半个世纪,有关古都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城市历史文化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多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从法律法规上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和建设,由此也推动了中国古都研究出现较大发展,出现了古都等级差别的讨论及大古都认定条件或标准的争议。

关于大古都的说法始于民国初年,不过并无人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更无人提出相关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关于何为大古都、大古都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成为大古都等问题,并无专门的论述。当时约定俗成的六大古都分别是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大多数人表示认同,或未有人提出异议,遂成定论③[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等城市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都是多次建都,并且都是中国大一统时期的都城,因而无人能对其大古都地位提出异议。自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安阳应列为大古都以后,就引起了相关的学术争鸣,并由此推动大古都研究成为古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相关学者纷纷提出了大古都的认定条件或标准,关于大古都研究则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围绕安阳和郑州两城市是否可以列为大古都等相关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过去著名专家学者写一本书或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一锤定音不同,在学术多元化的新时期,关于大古都的认定条件众说纷纭,即便是如谭其骧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也不能一言九鼎,一槌定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相对权威的学术机构,在大量研究、取得共识基础上加以认定。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中国古都学会遂成为这样的学术机构。该学会是由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社会人士共同组建的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聚集了国内一大批古都学、考古学、历史学、城市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成为众望所归的对大古都地位进行研究和认定的学术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中国古都学会认定的大古都相继有安阳、郑州和大同。目前,由中国古都学会先后认定的大古都共有9个,分别为“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郑州、大同”[3]11-12。尽管仍有个别学者持有异议,但因得到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基本成为定论。中国古都学会毕竟是民间学术组织,所作出的学术认定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执行效力。近年来,有关大古都的学术研讨仍在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永无止尽,对大古都认定标准进行学术争鸣也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开展大古都研究,虽然是学术问题,但其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超越了学术领域,对于那些可能被列为大古都的候选城市而言,则涉及到如何评价其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如何提升城市形象、构建城市品牌等相关问题,因而会有若干非学术因素参与进来。不过,我们坚信非学术因素不会也不可能操纵学术研究。30多年来,正是不断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与大古都相关的学术讨论,才推动了中国古都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如何判断一座古都是否可以成为大古都,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判断标准。谭其骧先生首先对于大古都提出了两条主要标准:一是“主要看以此城为都的政权地有多大”,二是作为都城“历时有多久”,但他不同意以“今天的城市的大小为取舍标准”[2]。正因如此,谭先生认为安阳作为商都,尽管后续发展不大,但也应纳入到大古都行列。陈桥驿先生赞成将安阳列为大古都,并对大古都判定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无论在地理位置和山川地形方面,都具有十分优越的形势”,二是“它们建城定都以前,都曾经作过非常精心周到的规划设计”,三是“当年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还接待了瀛海来客,聚集着万国衣冠,是举世闻名的国际都市”[4]序,3-4,四是“大古都必须曾经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都城”[5]。马正林先生不同意将安阳列为大古都,并提出了确定中国大古都的五个基本条件:1.建都历史悠久,2.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优越,3.是全国政治或经济文化的中心,4.城市建设宏伟,5.应是延续发展而成为全国著名都市的城市[6]。邹逸麟先生支持谭其骧先生所提出的将安阳列为大古都的建议,同意用“建都的历史悠久性,地理位置,山川形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建规模”等作为大古都判定的标准,反对将“延续发展而成为全国著名都市”作为必备条件[7]。徐建春先生也明确提出:“马先生的这个确定大古都的条件,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讨论古代的都城，把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的都城一笔抹杀，不考虑一个大古都所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状况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8]葛剑雄先生针对安阳可否列为大古都的讨论，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即对古都的大小等级进行量化分析，量化指标主要有：建都时间、都城性质、疆域幅员、控制程度、遗址遗物、今城等级、重合度、继承度和知名度等，其中建都时间所占比重最大，每年1分，而其余各项指标则仅只有1分[9]。另外，葛剑雄还提出进行量化分析的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历史事实是决定古都重要性的前提；第二，必须确定历史上的都城与今天作为古都的城市之间的关系；第三，今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同样应该重视；第四，应该站在今天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封建正统的、某一个民族的或某一个地方的观念，来评价古都的重要性[9]。李令福先生认为：“一般认为大古都应该达到以下标准：这个古都在一段时间内作过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中心，比如现在公认的‘八大古都’，都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这是基本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古都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很特殊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八大古都’均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第三是这个古都要和现代的城市有某种关联，‘大古都’的选址应有一定的延续性。”[10]150朱士光先生在综合各家之言后，提出一个古都是否列为大古都应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应是我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二是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时间，一般在200年以上；三是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四是在它遗址上或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11]519。由于朱士光时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因而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都学会对大古都的权威看法，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综合以上相关学者关于大古都认定条件的讨论，有一些条件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首先，大家都认同“都城历史积年要长”这一条件，但关于至少要多少年才可进入大古都行列，仍然有不同看法；其次，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大古都应该是“正统”（主流、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此外，对于大古都应该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和贡献，也都表示赞同。最有争议的焦点，就是可否将“延续发展而成为全国著名都市”作为条件。这涉及到对安阳的古都地位评价：有了这一条件，安阳就不能列为大古都；没有这一条件，安阳就可以加入大古都行列。另外，对于大古都是否必须是“正统”（主流、主体、主干）王朝都城这一标准也有不同看法。史念海、陈桥驿、朱士光等诸位先生都一致认为，大古都必须是“正统”（主流、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对此，葛剑雄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该站在今天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封建正统的、某一个民族的或某一个地方的观念，来评价古都的重要性。”[9]我们完全赞同葛剑雄先生的观点，认为将是否是“正统”（主流、主体、主干）王朝的都城作为大古都的必备条件不妥，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在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政权和不同民族对于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国家外，在北方、南方和西南地区都相继建立了若干国家，其中部分国家管辖的面积也颇大，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以主流（主体、主干）王朝的都城作为大古都的必备条件，显然就是要排斥所有非主流（主体、主干）王朝的都城进入大古都行列，这明显不符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事实。此外，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多次大分裂时期，如三国魏晋南北时期、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就没有统一王朝，而且三国时期魏、蜀汉、吴都号称正统，并且都以统一为目标，因而此一时期何来主流（主体、主干）王朝？虽然今天是在评价历史上的大古都，但是不能受传统“正统”观和狭隘的民族观影响，要站在全中国的角度、中华民族的立场来进行分析研究。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来看，历史上中国范围内任何一个曾经作为某一独立政权的都城，无论是地处边疆还是内地，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统一全国政权还是分裂时期政权，只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只要符合多数研究者认同的“大古都”评价标准，就应该将其纳入大古都行列。

在去掉“正统”王朝都城这一条不合理的条件之后，再综合学界大多数学者关于大古都的认定条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判定什么样的城市可以进入大古都行列。第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包含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陈桥驿等学者都强

调大古都应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是一个城市赖以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更是都城选址的重要条件。第二,悠久的建都历史和建都历史积年。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这一条作为判断一个古都是否可为大古都的必备条件。普遍认为悠久的建都年份是一个大古都最重要的组成因素,也是决定古都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葛剑雄先生更是将其计量权重放在所有条件之首。第三,重要政权的首都。重要政权不仅应包括统一王朝时期的都城,也应包括对峙时期或分裂时期主要政权的都城,还应包括先秦时期重要国家的都城。第四,较大的区域影响力。较大的区域影响力对于大古都的评价十分重要,不仅要考察该政权管辖的范围,而且还应考察该都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五,较大的城市规模与较为宏伟的城市建设。一个古都是否可以称之为大古都,关键在于一个"大"字,这无疑与该古都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该都城的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第六,有较强的城市延续性。虽然有学者认为不能将此作为必备条件,但是城市延续性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如果一个城市从古代延续至现代,都一直作为大城市而发展,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城市明显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等五大都城都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因此,可以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发展作为大古都的重要参考指标。

当我们以上述大古都认定条件来重新审视已被评为中国 9 大古都的城市和未被评为大古都的若干城市,就会发现仍有少数古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人忽略而未纳入大古都行列,成都就是其中之一,成都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和准确的评价。顾炎武著《历代宅京录》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历代都城记述的著作,该书一共列有 40 余个都城,其中"卷十"即为成都,但是顾炎武对成都的都城沿革记述并不完全,只记述了蜀汉、成汉和前蜀、后蜀等数个政权在成都建都之事,既没有论及先秦时期五代蜀王在成都建都的历史,也没有记述西汉末公孙述在成都建"成家国"称帝之事。由于《历代宅京记》是第一部关于中国都城的重要著作,影响颇大,其观点常为后人引用,故而对成都的建都史研究产生了一定误导作用。先秦时期,五代蜀王在成都建都之事,始见于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但其所述内容极为简略,并有神话传说色彩和文学夸张成分,尤其对重要史事语焉不详。因而,无论是顾炎武,还是其后的研究者,多对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不甚重视,一般是从秦并巴蜀以后才将成都纳入信史的研究范围,部分研究者至多将成都的都城历史向前推至开明九世(或五世)迁都之时。尽管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成都古城遗址群、船棺遗址、金沙遗址等一系列大型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在成都城区和周边地区相继被发现,成都的早期都城历史也随之而被改写,然而相关考古成果却并未引起中国古都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少古都学研究者仍然以老的眼光来看待成都。近年来,虽然对成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考古研究成果外,还有大型学术著作《成都通史》等书出版,却较少有研究者从古都的角度对成都历史进行研究。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关注到成都的大古都地位,如台湾学者吕佛庭撰《中国十大名都》就将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名都之一④[12],刘志宽等主编《十大古都商业史略》也将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⑤[13]283,李国成编《中国古代十大名都》同样将成都作为十大名都之一⑥[14]。另外,有人撰《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名称由来》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古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和排名,成都在以殷墟为肇端的大古都排名中列第 8 名、在以二里头遗址为起点的大古都排名中排第 9 名,均列在前 10 位⑦。以上的研究和排名,仅为个别人的见解,未能成为定论,也未引起中国古都学会和相关权威专家的重视。加强对成都大古都地位的研究,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既可推进中国大古都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也可推动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同时有助于当今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深化和城市形象的提升,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从大古都认定条件来考察成都的大古都地位

依据以上所梳理出的大古都六大评定条件,下文将结合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来考察成都的都城历史,并进一步分析成都是否可列为中国大古都。

(一)从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考察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坐落于川西平原上。

距东海 1600 公里，距南海 1090 公里，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城市，“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15]175。成都以西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向东则是宽广的川西平原，良田沃野，水系纵横；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雨热同期，十分利于农业生产。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岷江、沱江及其他大小河流四十多条流经成都平原，便于引水自流灌溉。成都在四川盆地内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居于成都平原重要交通枢纽区位，“成为手工业者聚居的理想场所，从而推动了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16]。《管子·乘马》强调了定都的理论原则：“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17]卷一《乘马第五》,12 成都的自然地理完全符合以上关于定都的基本原则，成都建在龙门山脉、邛崃山脉和龙泉山脉三山之间广阔平原的中央区，既在大山之下，又在广川之上。战国时期，蜀郡郡守李冰主持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成都平原的水患，成都平原河网交错、灌渠密布，从此水旱不饥，时无荒年，因而在东汉后期，成都平原取代关中地区成为“天府之国”。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在政治上有利于保障统治集团的利益，军事上有利于国都安全，经济上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并长期地支撑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正是成都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因而很早就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先秦时期，五代蜀王在成都建都立国。秦以后，成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著名大城市和多个政权选择在此建都，自然环境的优越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成都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古代关中地区、河洛地区相比，具有若干共同之处，因而成都、长安、洛阳三城市建立以后，一直就是区域内的重要中心城市，既使在失去都城地位后，仍然保持着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与成都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成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成都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从而长期支撑着城市持续发展。而黄河流域若干城市之所以在失去都城地位后就很快消失在历史舞台之上，原因固然复杂多样，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无疑是其中原因之一。

成都除微观和中观自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外，宏观地理也有相当的优越性。从区位空间来看，成都位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心，以成都为原点，成都与中国中西部重要城市的距离基本相等，因而成都成为古代中国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18]，由此决定了成都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先秦时期，五代蜀王相继在此建都立国，并创造了辉煌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包括金沙文化）。秦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对成都的经营，将其视为战略重镇。唐代中期，成都一度作为“南京”，成为陪都。抗战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支撑，为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 1/3 的兵员、粮食和财力，由此可见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从建都历史积年考察

就目前有关大古都的标准来看，建都历史积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按照现在较多学者认同的标准来看，大古都的建都历史积年应在 200 年以上。

在以往的研究中，成都作为都城的历史只是从秦统一中国后开始计算。从西汉末年至唐末五代，先后有五个重要政权以成都为都城，即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各政权的起始年份皆十分清晰准确，以上五个政权在成都建都的历史积年共计 148 年。除此以外，还有大蜀与大西两个政权。北宋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控制了大半个四川，但不到两年就以战败而告终。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政权，但大西国也只存在了 3 年就结束了。以上各政权的都城历史积年，共计有 153 年（参见表 1）。若只以秦统一后成都建都历史积年计算，成都是达不到大古都建都历史积年应在 200 年以上的基本标准。故而，先秦时期成都的建都历史积年的多少，对于成都可否列入中国大古都行列至关重要。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完全未论及先秦时期成都的建都历史。史念海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也只是将成都的建都历史上推至开明九世。他认为：“蜀之立国亦在战国之前。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数起，至慎靓王五年，共 88 年。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市。”[19]史念海先生依据的资料为常璩著《华阳国志》，但《华阳国志》所载开明王朝之前的蚕丛、柏濩、鱼凫和杜宇四代蜀王在成都建都的历史却被史先生忽略而遗漏了。受其影响，当代大多数学者都以开明王朝迁都作为成都都城史之肇始，而不将开明以前四代蜀王的建都立国作为信史来看，只认为是一种传说而已。

要梳理清楚先秦时期成都的建都历史,仅靠现有的文献记载是无法取得突破的。因为仅有的一点文献资料可以作出多种解释,见仁见智。如果说《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的记载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只是一种历史传说的话,那么近数十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则使这些历史传说变成了历史传奇。20 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学家在以今成都主城区为中心的岷江三角扇形地带相继发现了三星堆古城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十二桥遗址、宝墩古城遗址群、船棺遗址、金沙遗址等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多个重要遗址,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古蜀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地再现,也使成都的都城历史从开明王朝九世向前推进至宝墩文化时期。据学者考证:"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是迄今为止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最早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据科学测定为距今 4500－3700 年间,前后有 800 年左右,宝墩文化系列城市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村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等多个古城。这是成都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群,是古蜀国历代统治者不断迁都形成的系列都邑。"[20]

宝墩古城遗址的面积为 276 万平方米,与同一时期的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的规模基本相当,是中国龙山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大型城市聚落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21]160 此外,在宝墩古城群中还发现有多处大型单体建筑或成组的大型建筑群基址,单体面积均在 200 平方米以上。据相关研究表明,这些大型建筑群遗址,"应为是当时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地处内城几何中心的鼓墩子区域可能是宝墩先民举行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22][23]。而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也是阶级分化,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考古发掘来看,宝墩古城群的发现表明,成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之一,远早于安阳商都,也早于周代丰、镐二京。

继宝墩古城群之后建立的三星堆古城,城市形态更完备,文化更发达[24]。三星堆古城巨大的城墙证明了"蜀具有强大的力量"[25]。近年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过充分研究后,均认为三星堆古城就是鱼凫王国的都城。林向先生明确指出:"相当于中原的夏商之际,在东亚'两河流域'之间的沃野上,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又一个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或称为古蜀文明。称它为文明中心,因为它是这片广袤的西南土地上,众多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中的佼佼者,影响着许多发展水平不齐的文化综合体,并以它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化区。"[26]278 有学者因此断言:"如果说宝墩等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那么在宝墩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王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24][27]50 因而,三星堆古城的发现将成都的都城历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

公元 2001 年,当人类迎来新世纪之际,成都主城区出现了更惊人的考古大发现,即金沙遗址文化的重见天日。金沙遗址总面积达 5 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还在周围十余公里范围内陆续发现了十余处商周遗址,与金沙遗址在年代关系上基本是同时发展、同步演进,具有"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由于金沙遗址的发现,成都主城区建城史向前推至距今 3000 多年前。这正好与《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载杜宇王朝的兴起年代相吻合。大量商周时期精美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的发现,表明杜宇王朝时期成都的早期文明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从金沙遗址考古的成果来看,金沙遗址的形成是在商周时期,晚于三星堆遗址时期,两个遗址的文化具有先后继承关系。前者为史书所载鱼凫国的都城,后者则为杜宇王朝的都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相距仅 38 公里,因而三星堆古城作为都城应与成都有着直接的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证实了早在距今 3000 年前,今成都主城区已经成为蜀国的都城。开明王朝取代杜宇王朝之后,一度将都城从今成都主城区迁至今成都近郊,但成都作为城市仍然存在并得到发展,正是因为有着城市基础,开明五世才能将都城迁回至今成都主城区。蒙文通先生根据相关文献认为开明氏"凡王十二世",传位 350 年,如果从开明朝亡于秦之年(前 316)往上推算,开明王朝建立的时间约当在公元前 7 世纪中期[28]42。因此,从距今 3000 年左右杜宇王

朝在今成都主城区建都到距今 2666 年左右开明王朝建立，杜宇王朝的都城积年为 330 年左右。由此，即使不算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的建都积年，仅以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在成都主城区的建都积年也达到 600 年以上。如果加上鱼凫王的建都积年，成都在先秦时期的建都积年则达千年以上（参见表 1），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表 1.成都建都积年表

政权名称	起始年代	建都积年
蚕丛国—柏濩国	约公元前 2500—前 1700 年	800（大约）
鱼凫国	约公元前 1700—前 1000 年	700（大约）
杜宇王朝	约公元前 1000—前 666 年	334
开明王朝	约公元前 700—前 316 年	350
小计		2184（大约）
成家	公元 25—36 年	12
蜀汉	公元 221—263 年	43
成汉	公元 304—347 年	44
前蜀	公元 907—925 年	18
后蜀	公元 934—965 年	31
大蜀	公元 994—995 年	2
大西	公元 1644—1646 年	3
小计		153
建都历史积年合计		2337

资料来源：《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成都通史》卷 1—卷 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

从表 1 可见，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甚长，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特殊样本。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在多个地区兴起的重要时期，西蜀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成为早期人类活动频繁的重要地区之一，因而国家和都城建立较早。宝墩古城距今 4500 年，占地面积 276 万平方米，双重城结构。要修筑如此规模巨大的早期城市，需要动员成千上万的劳动力来参与，而部落首领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大型工程的建设，只有已经形成了王权的国家才具备这样的力量。三星堆古城的发现，使历史传说变成了历史传奇，大规模的城池、大量的青铜器、象征权力的金权杖等都充分证明了国家的形成。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等距今成都主城区最远距离仅 30 余公里，最近的只有几公里，相互之间有着历史传承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杜宇和开明的都城，与今成都主城区高度重合，3000 多年来城址一直不变，这种现象在中国都城史上非常少见。因此，从建都历史积年来看，成都远超现已列为大古都的大部分城市（参见表 2），达到了大古都的标准。

表 2.中国九大古都建都历史积年统计表

古都名称	建都积年	古都名称	建都积年	古都名称	建都积年
西安	1077	南京	449	安阳	351
北京	903	开封	366	郑州	355
洛阳	885	杭州	210	大同	96

资料来源：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五）》，《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张新斌《郑州大古都的年代学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 21 辑——郑州商都 3600 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2004 年年会论文集》，第 47 页。

（三）从政权的重要性考察

先秦时期，在成都建都的五代蜀国，可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权，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十分巨大。而从中华文明兴起的角度考察，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无疑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中国和世界有着重要的贡献。

秦以后，有多个政权在成都建都。第一个政权为成家国。王莽新朝末年，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建立了“成家”政权。“成家”政权历时 12 年，时间虽然较短，但影响却深远。“成家”所控制的地域也较广阔，其疆域北抵秦岭、东至三峡，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二个重要政权就是蜀汉国。公元 214 年，汉室宗亲刘备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取得益州，“自领益州牧，广建官职”。公元 221 年，刘备在成都武担山即帝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以成都为国都，建立百官制度，筑立宗庙，大赦天下。刘备所建蜀汉国，表明其继承东汉正统，并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蜀汉是三国对峙时期的主要政权之一，在成都的建都时间长达 43 年。蜀汉政权的建立，对四川和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西南地区影响甚巨，并进一步奠定了成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第三个重要政权为成汉国。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氐族人李雄据成都，自称成都王。次年六月，李雄正式称帝即皇帝位，国号“大成”，以成都为都城；其子李寿即位后，仍然以成都为都城，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29]44。李寿之所以要将国号改为“汉”，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表明其政权继承了西汉、东汉和蜀汉的正统。“成汉”国在官职制度上采用汉晋混杂

的方式,建立起百官制度和分封制度[30]10。成汉政权存在的时间为41年,在历史上也有重要影响。第四个政权为前蜀国。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各地割据。公元907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史称"前蜀"。前蜀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政局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使四川地区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前蜀政权历时18年。第五个政权为后蜀国。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称帝后,半年即病亡,由其子孟昶即位,开始了后蜀在巴蜀地区长达31年的统治。孟昶是五代十国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为成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31][32]15。在孟昶的治理下,蜀中社会较为安稳,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城市、乡村都呈现一片富庶安乐的景象,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出现了其他地区未有的稳定和发展,其疆域与前蜀基本相当。从上述可见,蜀汉、前蜀和后蜀三个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均是中国分裂时期出现的重要政权。在各政权存在的时期内,各种兼并战争持续不断,由于四川拥有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这些政权建立后对于四川和西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3]52。

(四)从区域的影响力考察

蚕丛至鱼凫三代蜀王时期,蜀国的管辖范围无明确文献记载。据相关研究,杜宇王朝的疆域北达今汉中地区,南至四川青神县,以熊耳山为界,西达四川芦山、天全一带,东至嘉陵江,并以岷山和南中(今凉山、宜宾、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为附庸[34]152。开明王朝建立后,内整社稷,外扩版图。到开明王朝后期,蜀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西部大国,其疆域北至汉中盆地,东越嘉陵江,远达鄂西,西至青衣江羌地,南达宜宾、昭通等地,靠近南越[15]191。

三国时期,"蜀汉"国疆域则更广:北至武都、汉中,东抵巫峡,南面包括云、贵,西达缅甸东部,其国土面积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的大部分,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南部,另外还包括广西的西北部及缅甸的东北部、越南的西北部。蜀汉与魏、吴两国长期鼎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后蜀的疆域面积也较大,为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

此外,成都自先秦起就一直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商周时期,成都除了作为都城是政治中心外,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手工业已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系,其经济的聚集与辐射范围已超越蜀国的范围[16]。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至少战国时期就已开辟。秦统一全国后,合并巴、蜀,设蜀郡,成都成为郡治。两汉时期起,成都亦为益州、蜀郡、成都县的治所。此后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是中央政府经略西南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汉代,成都"备列五都",为秦岭淮河以南唯一的全国性工商业大都市,影响不仅及于西南,而且对于中国北方、南方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丝绸产品主要来源于成都;东汉以后,成都为全国唯一的织锦中心[18]1。此外,汉代成都还是中国的金银器和漆器生产中心,全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十分繁荣,名列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史称"扬一益二"。北宋时期,成都经济延续唐代的发展态势,从而产生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成都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物资集散中心,亦为全国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由此可见,成都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从城市建设规模考察

成都第一座古城——宝墩古城,建筑面积达276万平方米,仅次于同时代的石卯古城、良渚古城。鱼凫王的都城——三星堆古城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一处"由数十个文化点构成的若干个遗址所组成的大型遗址群"[35]1。早商时期,三星堆古城就已经开始建筑高大厚实的城墙,现发掘的三面城墙,南北1400米,东西长1600到2000米,三面围墙总长在5000米以上,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高4—6米[24]。杜宇王朝在成都所建的都城——金沙遗址,虽然还未寻找到城墙,但从目前考古发掘看,其面积至少达5平方公里,另外在其外围发现有大量的同时期的文化遗存,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是一处"大都无城"的典型。

秦灭蜀以后,以成都为郡治,仿咸阳制修筑大城,周围12里,高7丈,下设仓库,上建楼房;另筑少城为成都县治。汉代,成都城市规模甚巨,立18城门,另设有车官城、锦官城,其城市规模在全国居于前列。成都作为"成家国"的都城,建都时间虽然较短,但公孙述称帝后,按照汉朝帝王之制在成都大兴土木,建造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宗庙以及百官的衙署等[36]4,从而使成都的城市空间格局开始发生较大

变化，但城市总体上仍然保持了西汉时期大城、少城的基本格局，共有 18 道城门。蜀汉建立后，相继建造了一批壮丽的宫室。左思《蜀都赋》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比屋连甍，千庑万室。"[37]卷四，100-101 成都作为蜀汉都城，被时人形容为"既崇且丽"。所谓崇者，高大也；丽者，美丽、华丽也。可见，蜀汉成都是一座高大美丽的都城，在中国历代都城建设史上有其突出的特色。唐代，成都出现新的发展高峰，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原来的城市建成区越来越拥挤，迫于形势需要，西川节度使高骈在成都扩筑罗城，罗城规模极大，城周 25 里，高广各 2 丈 6 尺，城墙上建楼廊 5600 余间，开 10 座城门，门皆修筑有城楼。后蜀国建立后，成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因而孟知祥于罗城外修筑羊马城为外郭，城垣周长 42 里，高 1.7 丈，修建了 9 座门楼，建楼廊 4957 间，从而形成了羊马城、罗城、皇城、宫城四重城的套城格局。

由此可见，成都在历史上一直是规模较大的城市。在农业时代，普通城市人口只有数千人，若有数万人则是规模较大的城市，而成都城市人口长期保持在 20—30 万人左右[38]，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情况。

（六）从城市延续性考察

虽然有不少学者不同意将历史延续性作为大古都的必备条件，但有历史延续性的城市显然比没有历史延续性的城市发展得更好。从历史延续性来看，成都是一座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城市。秦以后，成都虽然多次历经灾难性破坏，但都能劫后重生，不断发展，3000 年以来城址不易，2000 多年以来城名不变，其古代都城城址与现代城市城址高度重合。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和"衰而再兴"能力，足见成都城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上具有罕见的特殊性。近年来，在成都主城内不断有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出土文物的年份从距今两、三千年至宋明清皆有，充分证明成都城市的稳定性、延续性。今安阳城不是殷都的延续，也不是由邺城发展而来，其城址曾多次迁移，与古都城址并不重合，但并未影响安阳成为大古都。相比之下，成都在中国都城史上既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并在今天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而有理由成为中国大古都之一。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学术界认定大古都的相关条件来综合考察成都的都城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成都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先后作为 10 个重要政权（先秦时期 5 个，秦统一以后 5 个）的都城，其都城历史积年在千年以上，是中国古都的一个特殊样本。

2.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之一，无论是作为都城时期，还是失去都城地位之后，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而且从汉代至唐宋时期一直是居于前列的全国性大城市。

3.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经历数次毁灭性破坏，但是每次都能劫后再生，先后出现过数次发展高潮。成都自李冰修筑都江堰以来的 2000 多年间，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城市影响力不仅超越四川和西南地区，而且对全国甚至域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考察成都的都城历史，成都在中国都城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特殊作用，符合大古都的标准，理应列入中国大古都的行列。本文强调成都在中国都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成都应该成为中国大古都之一，并非是对此前已列为大古都的某些城市的颠覆或否定，而是通过对成都大古都历史的研究，对现有的大古都研究予以补充和完善，并以此证明成都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成都跻登中国大古都行列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注释：

①史念海先生认为，中国"内地各省市共有 15 年以上的古都计有 53 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 172 个；不足 15 年的古都计有 79 处，涉及的政权 90 个；未知具体年代的古都 2 处，涉及的政权 4 个；另外还应该添上夏、商两代的都城和周的先世的都城 28 处。几宗合计：共有古都 162 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 269 个。周边各省区，可知有具体年代的古都 6 处，涉及的政权 8 个。未知具体年代的古都 47 处，共有古都 53 处，涉及的政权难以确知。内地与周边各地合计，共有古都 215 处，可知的所涉及的王朝或政权 277 个"。朱士光先生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多个古都，计为 220 个。

②都城的重要性在古代引起了不少文人的重视,撰写了若干关于个别都城的重要文章或书籍,如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三辅黄图》(作者佚名),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为我国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约18万字,记述了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代约40余个都城的建置、沿革、迁徙与分布情况,其内容丰富,考据精审,征引详核,但作者并未对古都进行系统研究,也未对古都进行科学的定义和分等,如谭其骧先生认为,《历代宅京记》"既没有包括清以前国史上全部古都,也未能提到这些古都的等差,哪几个称得上大古都"。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家等对古都研究较为重视,但也并未对古都进行系统研究,至多是对个别城市进行了一些研究。

③谭其骧认为,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才有些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列为六大古都。此后六大古都即成为普遍流行的,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提法,一直沿袭到80年代。

④吕佛庭将南京、北京、杭州、洛阳、开封、长安、成都、重庆、武汉、兰州等10个城市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都。

⑤刘志宽将"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成都、苏州、扬州、太原、北京"等10个城市列为中国十大古都。

⑥李国成将"北京、南京、西安、杭州、洛阳、开封、银川、咸阳、成都、安阳"等10个城市列为中国十大名都。

⑦佚名《中国古都等级划分和古都名称由来》指出:"第一种,以殷墟为肇端: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成都、巴林左旗、大同、江陵、太原、广州、福州、大理、银川、武威。第二种,以二里头遗址为起点: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郑州、成都、巴林左旗、大同、江陵、太原、广州、福州、大理、银川、武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buDoQEI920vVQ7FbDvBOZoxApkJxzPT9_nLZxn2lJBprA7ZSuP9q4xAm28Q-vnToQBQQOCCksKnMsXF4llJyWoq0dEsmwkFWjSCnazmjIC.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六)[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2]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2).

[3]叶万松,安大钧,韦娜.试论中国大古都城市的构成要件与生成环境——纪念中国古都学会成立30周年[C]//北京史学论丛(2014).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4]陈桥驿.中国六大古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5]陈桥驿.中国的古都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6]马正林.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7]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8]徐建春.也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3).

[9]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1).

[10]李令福.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的原因、过程及启示[C]//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总第2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11]朱士光.在郑州古都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C]//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吕佛庭.中国十大名都[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5.

[13]刘志宽,缪克洋,胡俞越.十大古都商业史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14]李国成.中国古代十大名都[N].中学地理报,1992-03-11.

[15]常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16]何一民.论成都城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17]管仲.管子[M].四部丛刊景宋本.

[18]何一民.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与古代成都的三次崛起——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19]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二)[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

[20]何一民.从历史文献到考古新发现: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J].未刊稿.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报告[C]//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新津县宝墩遗址外城罗林盘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12).

[24]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N].中国文物报,1989-09-15.
[25]罗伯特·贝格勒.四川的商代蜀城[J].谢丹,译.四川文物,1995,(6).
[26]林向.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7]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N,C].中国文物报,1989-09-15.//段渝.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9]谢元鲁.成都通史:卷3[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30]李敬洵.四川通史:卷3[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31]张邦炜.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32]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卷4[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33]粟品孝,等.成都通史:卷4[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34]段渝.四川通史:卷1[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35]陈德安,魏学峰,李伟纲.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6]王文才.成都城坊考[M].成都:巴蜀书社,1986.
[37]左思.蜀都赋[G]//萧统.文选.胡刻本.
[38]谭继和.成都历代城市人口的变迁:附表3[J].成都地方志通讯,1984,(2).

The Status of Chengdu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apitals

HE Yi-min, LU Yu-si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Great ancient capital, viewed as city brand, has been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us related research has become a hot spot. Based on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s of a great ancient Chinese capital,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in-depth capital history of Chengdu, combining with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considers Chengdu as one of the cradl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ne of the Chinese most historic ancient capitals. Chengdu's capital-founding history i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Besides, Chengdu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tial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It has been ranking the forefront of the China's largest citie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and has been the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of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whenever it is in capital status or not. Although Chengdu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devastating damage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 always survived from the disasters, and even appeared several development climaxes successively. The influence of Chengdu is not only beyond Sichuan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 but also reache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By studying the capital history of Chengdu o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holds that Chengdu has fully met the standards of the great ancient capital, thus it deserves to be listed among the ranking of the Chinese great ancient capitals as it were.

Key words: the Chinese capital history; ancient capital; the standards of the great ancient capital; Chengdu

[责任编辑:凌兴珍]